

预出版版本

难忘的怀念

——悼念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同志*



宋振能

中国科学院 北京 100864

摘要 杜润生同志是中科院早期杰出的党、政领导人之一，为中科院的发展和中國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构建、重大规划的形成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为怀念他的上述业绩和贡献以及他为人处事的高尚品德，特撰此文以表深深的敬意和悼念。

关键词 杜润生，中国科学院，怀念

2015年7月31日，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不幸逝世，相隔仅两个多月，中科院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同志（以下简称杜老）又于10月9日凌晨6时20分离开了我们，这两位中科院卓越领导人的先后离去，引起了无数中科院人的怀念和哀伤。

因我曾有幸在杜老的领导下工作过，并认真研读了一些有关他的著作，为了表达我对杜老的敬仰，现对他解放前的生平及对中科院的主要贡献和可贵品格作一简要介绍。

1 解放前的简要生平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出生，中学毕业于原太原国民师范，肄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5年，积极参与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参加抗日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大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2 到中科院工作的缘由

新中国成立时，杜老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3年，正值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毛泽东主席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任部长，杜老任秘书长，见面时，毛主席交代邓子恢和杜老的任务主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6年4月20日

要是搞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当时，他们对这场运动怎么搞已有了一些想法，见到毛泽东时便直接提了出来，毛泽东最终不仅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相反却批评他们这些意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是右倾错误”。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中央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老，批评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候，像小足女人走路”，不过，最后毛主席对杜润生作结论时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注：这些对杜老的批评和处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得到了平反）。就在杜老临下去实践之前，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突然找杜老谈话，告诉他“先不要下去了，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再下去。……现在中央成立了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要搞科学规划，……要几个具体负责同志去。……张劲夫同志任委员会秘书长，由他负领导责任。”（规划委员会主任为陈毅，不管具体工作。）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由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的一个10人小组具体主持制订。规划以中科院刚成立的几个自然科学学部和技术科学学部的全体学部委员（院士）为基础，并陆续组织院内外各单位与规

划有关的数百位著名科学家、教授，集中在北京阜成门外的原西郊宾馆（后改为中共华北局办公地点），按照国家建设急需的重要任务和学科分成小组，讨论编写各自的规划，最后由杜老担任主笔，完成了这个迄今世界上第一个时间长达十二年的科技远景规划（图1）。

当科学规划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杜老向组织部安部长提出：“我的任务完成了，……希望赶紧分配我工作，下地方锻炼。”想不到安子文说：“不行，你走不了啦！……，现在中科院党组要改组，……中央很重视中科院，要中科院成为科学的火车头”。同时，张劲夫对杜老在搞“科学规划”时的突出表现也很称赞。这样，杜老就被留在中科院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3 对中科院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张劲夫曾被赞誉为“新四军的四大才子之一”，在中科院，更是位公认的能文能武的全才。他能适时地提出中科院的总战略和总任务，并能识贤任能，按中科院党组各位成员的专长妥善合理地安排各自的分工；他还能随时注意到中科院科技工作者和职工中的突出和典型人才，及时表扬激励；他作报告时语言生动有力，讲到兴奋时，有时甚至脱掉外套并配合肢



图1 1956年6月1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中科院的部分领导与在北京原西郊宾馆参加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部分工作人员合影。第一排右四为杜润生同志。照片中还有第一排右五张劲夫、右六郭沫若、右七范长江同志，第二排右十三为笔者宋振能。

体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动员力，可以称他是中科院的总操盘手，而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裴丽生（从山西省省长任上调来）和杜老，则可以说是张劲夫得力的左膀右臂。裴丽生是位“务实家”，工作认真、细致、踏实，一丝不苟，凡分工由他负责的各项任务和其他后勤事务，特别是有关国防方面的科研项目和任务，更是专心致志地了解情况，仔细思考和督促检查，紧抓不放，对科研工作，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发射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杜老则是个“首席智囊”，他主持编写的各种重要文件、报告和所作的讲话，都力求完善无暇生动，且具有原创性，因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张劲夫曾称他为“我的大秀才”，实际上也就是中科院的“大秀才”和“大笔杆”，对中科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和主张。他的聪明睿智、政策水平和极高的写作水平，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杜老对中科院的重要贡献，根据我的了解，可以归纳为3方面：

3.1 依靠和尊重人才，在反“右派”斗争中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

杜老作风民主，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很好地依靠、信任和尊重科学家，经常以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各种形式虚心倾听科学家、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有关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最后集中他们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断。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957年中科院在反“右派”斗争中也不得不确定了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伤害了这些无辜的同志。但中科院党组很快就发现，如果把大量被称为“国宝”的著名科学家和优秀青年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定为“右派分子”，对当时我国相对落后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于是，张劲夫当面向毛主席陈述了利害关系，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杜老就据此主持写出了保护科学家的政策界限。通过张劲夫和杜老等的大力争取，从而保护了一大批知名科学家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例如，当时民主同盟的五大教授曾

昭抡、华罗庚、钱伟长、千家驹、童弟周曾写了一篇《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文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提纲。其中主要在院外工作的曾昭抡、钱伟长和千家驹都被定为“右派分子”，而中科院的华罗庚和童第周却被保护了下来，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

3.2 主持制定“十四条”“七十二条”和“三十六条”

“十四条”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简称。这个条例（草案）本是中科院党组为了纠正本院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某些偏差和错误而制定的，当时在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提出“插红旗”“拔白旗”，批“走白专道路”“科技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等错误口号，中科院的某些领导部门和不少研究机构也不同程度地效仿实行，并出现了“瞎指挥”“浮夸风”等严重错误。因而伤害了一批著名教授、科学家和优秀中青年。1959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科院决定在北京选择两个研究所为基点，派两个工作组由张劲夫和杜老担任组长到基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全国各地所属分院和研究所等广泛征求意见。当掌握了一些典型材料和大量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就专门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由各分院、研究所党组织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听取意见。然后由杜老主持起草了一个条例意见的初稿，送请院外有关领导人审阅并在院内继续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最终形成了“十四条（草案）”。随后送呈当时中央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中央科技小组组长聂荣臻审阅。聂总看后十分赞赏，决定以国家科委、中科院两个党组的名义，再加上一篇以他自己名义写的说明报告送呈中共中央。中央审阅后，很快就作出批示并把聂总的报告，连同“十四条（草案）”，于1961年7月19日颁发全国普遍施行。中共中央的批示明确指出：“这

份文件不仅适用于中科院，而且适用于全国有知识分子工作的地方”。文件在全国施行后，解决了当时对知识分子较集中单位的许多问题。因此“十四条（草案）”曾被普遍赞誉为我国的“科学宪法”。

为了使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各项工作有所遵循，杜老又主持编制了“七十二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条例》的简称）。在条例中，对研究所的各项主要工作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条例中特别指明：

“研究所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所长为首的所务委员会负责制，并特别明确提出所一级的党组织是全所的领导核心，而研究所下属各级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七十二条”于1961年9月15日下发给中科院所属各分院和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实行。这样，就使各研究所有了明确而详尽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1963年的夏秋之交，笔者曾被邀参加在中关村福利楼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会议由杜老主持，开始时他简要地说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报告和国家科委、中科院党组制定的“十四条（草案）”已经使全国科技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得到了解决；1961年颁发的“七十二条”又解决了怎么办研究所的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中科院的位置和怎么组织管理科学研究所的问题。我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座谈会通过大家讨论，决定从调查研究着手、多方面听取意见后再决定怎么办，最后的结果便是制定了“三十六条”（即《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的简称）。并于1964年4月4日经中科院院务会议决定下发颁布试行。

凡由杜老主持编写的文件、报告，总是希望有所创新，不落俗套。“七十二条”中的科研项目分类的确定，便是其中的一例。此前，国际上对于科技项目一般只分研究和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两类，在制定“七十二条”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为了统一科研项目的分类和计算，提出把科研项目

划分为3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结合我国科研工作的特殊情况，杜老经过深思熟虑后，在“三十六条”中特别把科技项目创造性地划分为4类：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研究，并明确规定各项研究的数量比例，由各研究所根据本门学科的特点，灵活执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科院的科技工作者，曾长期反复争论理论联系实际应如何理解。该条例首先就解决了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时，还化解了院外一些单位（如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对中科院科技工作的误解和批评。这项规定，对中科院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3.3 在每年召开一次的院党组扩大会议作总结讲话或总结报告

通过几年的经验积累，从1960年开始，中科院党组逐步形成了每年召开一次院党组扩大会议的惯例，邀请中科院各分院、各研究所的党组织负责人及有关科学家参加。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讨论总结当年的工作和部署下一年度的工作。为了开好会议，杜老都是事先组织人员到有关单位深入了解科研情况、成果和问题，通过讨论集中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作有明确针对性的讲话；或主持写出报告，对中科院的下一年度工作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个惯例后来就被历任的中科院党组或院领导所沿用。

此外，杜老在1960年召开的中科院第三次学部大会上，受委托就“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作了深刻、透彻的报告，并在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专门组织编制了一个加强理论研究的“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对我国加强“大跃进”后被削弱的基础理论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国1959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科院在北京的几个研究所为解决全国粮食严重短缺的困难，研究出叶蛋白、橡子粉、小球藻和红萍等几种粮食代用品，杜老就此主持编写了一份采用粮食代用品以辅助粮食不足的报告。该报告以中科院党组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很快就被采纳，并立即召开各省、市、自治区

负责人或代表参加的会议贯彻执行。像这类有重要影响的事例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4 可贵的工作作风和品性人格

4.1 思维敏捷，分析透彻，力求创新

杜老思维灵敏，讲话生动明确。他听完别人的讲话，总是能很快抓住问题和关键。他的讲话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分析问题透彻、深刻，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1957年，中科院共青团总支部在当时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一次反“右派”青年大会，笔者被邀主持这次会议。会上数学所的一位团支部代表在发言中批判该所一位青年主张的“一本书主义”言论。在总结讲话中，杜老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明晰中肯的分析。他说：“这个青年写书的动机如果是为了个人追名逐利，那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判。但我们不能为此而批判写书。中国的科学技术现在还远远地落后于世界科技上先进的许多国家，发表的书刊也少得可怜。现在我们不仅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一本书，而且还需要科技人员作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写出一百本、一千本、一万本高质量的书籍，供人们阅读，为国家争光。”杜老这一非鲜明的深刻分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忘的回忆。

杜老主持编写的文章和所作的讲话，一般都要求有所创新，对此前的文献要有新突破。他从来不讲废话、空话、套话。上述他主持编制的“十四条”“七十二条”“三十六条”，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由他主笔撰写的国家《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中提出编写这个规划要“以任务带学科”“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等新颖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法等，为规划的顺利完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领导同志的赞赏。“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中央把他调回本来从事的农业领域，并任命为这些部门的中央领导人。这个时期，他主持编写的有关发展农业的文件，多年都被中共中央作为第一号文件发布，并在全国执行，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我国国计民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4.2 宁愿自己受冤，绝不嫁祸他人

杜老是位敢于担当、善于领导的好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他还受过两次冤屈。一次是1960年，当他升任中科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之后。当时前苏联科学院的秘书长打电话给中科院，希望派一个科学家到中国进行“人参”的考察工作。那时正是中苏关系发生恶化的转折时期，中科院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秘书长谢鑫鹤当时没有向党组负责同志请示，就发电报答复表示“同意”。按以往中科院与国外来往的惯例，电报都是以秘书长的名义署名，因此在杜老不知道的情况下，电报就署上了“杜润生”的名字，这封电报违反了中共中央规定的外事纪律。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异常愤怒，因为在此前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杜老，说又是这个“杜润生”，要对他严肃处理。后来经过张劲夫解释了事情的真相，杜老才避免了这次危机。

另一次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陈伯达的授意，他是中共中科院党组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领导人。造反派批斗他的罪名，除了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以外，还说他是中科院所谓“杜家班子”（由经常帮他起草文件、报告的同志组成）的头头，贯彻执行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等，并采取各种威逼手段，要他揭发批判张劲夫等党组其他成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尽管受到各种残酷折磨和迫害，杜老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贞不屈，没有诬陷过任何其他领导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批斗他而受到牵连也被迫害的一些同志，多次表示这是他“最大的遗憾”，此事更加显示出他那宝贵和极为感人的品质。

4.3 为人宽宏大量，重视和爱护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手让干部工作；对干部良好的表现，总是适时给予称赞和重用，如果发现问题和错误，却是谆谆教导，耐心指出并帮助改正

汪志华同志是一位在组建中科院时就在院部工作

的老同志。他也是位“笔杆子”，张劲夫任院党组书记时，他又是杜老领导下起草编写重要文件和报告的主要骨干。工作勤勤恳恳，经常不辞辛苦地加班写作，甚至通宵不眠地工作。由于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对中科院所作的重要贡献，受到院领导和杜老的高度称赞和评价，多次给予表扬，杜老还称他是中科院的“活雷锋”。后来汪志华被提任中科院计划局局长、政策研究室主任、院党组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959年，党中央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要求各部门、各地方编写各自十年来的成就。笔者和《科学通报》编辑部的汪容同志被抽调在杜老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这项工作长达近一年。杜老性情开朗和善，见面时总是面带亲密友好的微笑。工作开始时他明确详尽地向我们部署了编写的目的、要求、步骤和具体安排。初稿写出后，他又安排把初稿打印出来，每周要听取我们两三次所写初稿的汇报。开会时，他边听边看打印出来和我们所念的初稿，对其中的正确部分总是点头表示首肯和赞许，而对于不太满意和有疑问、缺失的地方，就让我们停下一起讨论，耐心地指出问题所在和怎么补充修改的意见，从未给过我们任何批评和指责。他的这种领导风度使我们深为感动。

自1951年迄今，我亲历中科院的发展已近65年。自1949年创建中共中科院党组，至1956—1966年以张劲夫为首的中科院党组，已经是第四届。这届党组各位成

员同以郭沫若为首的各位院长、副院长一起，虽然在当时上级有时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下，也有过比其他单位轻微一些的错误和偏差，但总的来看，这十年是中科院领导力量非常强、领导班子配备比较整齐、业绩十分突出的十年，工作有声有色，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和兴旺发达的景象。直到现在，还被中科院许多著名老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职工念念不忘，被称誉是中科院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取得的许多成就，其中就不乏杜老殚精竭虑、缜密规划和不懈努力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现在，杜老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寿高102岁，是这一届中共中科院党组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

为缅怀他在中科院的突出业绩和贡献以及他为人处事的高尚品德，特撰此文悼念。同时，也藉此文纪念和他同一届辛劳工作、为党和人民都作出宝贵贡献的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和成员裴丽生、秦力生、谢鑫鹤、郁文等诸位老领导、老前辈，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悼念。

后记：《中国新闻特刊》2015年10月19日第38期（总第728期）82—86页刊登的“破局者杜润生”一文，因忙于如期出刊，其中登载访谈我所谈有关杜润生同志在中科院的情况，定稿时没有让我看过，有数处与事实不相符合。为此，有关报刊和个人如引用本刊《难忘的怀念》一文作为有关杜润生的报道均以上述为准。

Unforgettable Rememberings

—In memory of DU Runsheng, the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ong Zhen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Abstract Du Runsheng w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leaders in the early ag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he contributed extraordinari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ns for the progress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To memorize his abov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also his respectful dignity, this paper is designated to demonstrate our heartfelt respect and profound condolence.

Keywords Du Runs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emorize

宋振能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1929年11月7日生，福建莆田人。1950年冬毕业于原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51年3月到中科院从事生物学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1964年任中科院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自1977年起，先后任中科院一局（生物局）负责人、中共中科院动物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1987年调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任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从事中科院院史和中国现代生物学史研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刊》常务副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主持或参与编纂了《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1,2》《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等著作。

Song Zhenheng Senior Engineer of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Born in 1929 at Putian, Fujian Province, he graduated in 1950 from Department of Biology, former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then joined CAS and worked on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for biological organizations. He was pointed as deputy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ve office, Division of Biology, CAS in 1964. From 1977, he served as leader of the First Bureau (Bureau of Biology), CAS, Secretary General and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Zoology, CAS, Deputy Director of Division of Biology, CAS, etc. In 1987, he joined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AS as senior engineer, focused on history research of CAS and China's modern biology, also as the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for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njoyed the special subsidy from state council. He hosted or participated the compiling of "Biography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 Science · Biology", Volumes 1 and 2, "Transcript of Genetics Forum", "Historical Events Highlights for Biology Development in CAS (1949–1956)", etc.